

埃及新闻业：历史、革命与秩序重建

胡杨涓

埃及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但在新闻业起步较晚，开始于19世纪初。奠定现在埃及新闻业格局的，主要是埃及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一些政策与变动。2011年以前，埃及经历了穆巴拉克长达30年的统治，在他统治的前期较为自由的新闻政策之下，埃及的新闻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仍然由政府直接控制。在2011年埃及“1·25革命”中，埃及新闻业既扮演了重要角色，也迎来了自身的一次“革命”契机。革命后，埃及新闻业和其它很多社会环节一样面临着秩序的重建。

一、埃及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埃及新闻史

自1952年“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建立埃及共和国以来，埃及主要经历了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三个较长的总统统治时期。这三位总统统治时期的新闻政策各有不同，但总体上来说实行的都是限制新闻自由的政策。

在纳赛尔统治初期，埃及就已经有几家历史悠久、影响力较大的私营报刊：如当时阿拉伯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埃及人报》、无党派的日报《金字塔报》、大众报纸《消息报》和周刊《鲁兹·优素福》等。这些报刊对舆论的影响力比较大，令纳赛尔感到不安，为了压制报刊的批评，政府实行新闻检查，并关闭了发行量最大的《埃及人报》。1960年，为了进一步控制报刊，纳赛尔以实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名义，将几乎所有报刊归并到几家较大的出版社——出版《金字塔报》的金字塔出版社、出版《消息报》的今日消息出版社、出版《图画》周刊的新月出版社、出版《鲁兹·优素福》的鲁兹·优素福出版社等，出版社的所有权则移交给当时埃及唯一的政治组织“民族联盟”，且规定报刊必须经民族联盟许可才能出版。这是变相国有化。另外，由几家私营出版社联合创办的中东通讯社也被收归国有。

广播电视方面，埃及的广播电台早在革命初期就已成为国营新闻机构，1960年埃及第一家电视台开始播放节目，与广播电台一样，电视台也是国营的，由国家财力支持，作为宣传工具，广播电视在社会动员、为政权赢得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纳赛尔政权对新闻业实行的这种“国有化”，加之当时埃及与以色列处于长期战争状态，使得埃及逐渐形成了“动员型”的新闻体制，政府与报刊关系紧密，基本是合作的状态。

作者胡杨涓，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萨达特上台后,延续了纳赛尔时期建立的基本新闻体制,但逐步放松了对新闻媒体的管制。20世纪70年代,萨达特先后取消了新闻检查、颁布新的新闻法,成立隶属于总统的最高新闻委员会(Supreme Press Council),由改名为“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原“民族联盟”)的政治组织领导人担任委员会主席,埃及各主要报刊主编都是该委员会成员,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拥有报刊51%的所有权。不过,对于广播电视业,萨达特没有放宽管控。1970年,埃及政府建立了国家机构埃及广播电视联盟(Egypt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on, ERTU),将全国的广播电视台置于政府的绝对掌控之中。1980年,埃及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规定,新闻机构是独立于国家立法、行政、司法的“第四权力机构”。宪法上肯定了新闻机构的独立地位,新的新闻法规定:“新闻工作者是独立的人士,他们在工作中不受非法律权力的约束”;“在法律范围内,新闻工作者有权从各方面获取新闻、材料和数据,并有权加以发表”。然而,这只是纸面上的,实际上埃及的传媒受到的控制仍然是比较严格的。

萨达特遇刺后,继任的穆巴拉克延续了较为宽松的新闻政策。这一时期,埃及的报刊逐渐向商业化发展,金字塔出版社、今日消息出版社、解放出版社等转变为大型媒介集团,形成了以这些媒介集团的代表性报纸《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主导的报业格局。虽然这些报刊基本采用商业化的运作方式,但其性质仍然是国有或半国有的,扮演着政府喉舌的角色(尤其是第一大报《金字塔报》)。从2004年开始,以《今日埃及》为代表的一些私营“独立报纸”的出现为埃及社会提供了另一种声音。允许私营报刊的出现是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新闻政策的一大进步,不过这些报刊仍然要接受最高新闻委员会的事后审查。

埃及的广播电视业在穆巴拉克时期经历了较大的发展。广播电台使用多种语言向泛阿拉伯地区播音。20世纪90年代,埃及发射了尼罗河卫星,成为第一个拥有卫星的阿拉伯国家。随后埃及建立了多个卫星电视台,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包括埃及卫星电视一台、二台和尼罗河电视台的

8个频道,内容覆盖新闻、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这些电视台都为政府机构埃及广播电视联盟所有,另外,埃及广播电视联盟还拥有尼罗河卫星40%的股份。尼罗河卫星不仅为埃及的卫星电视频道服务,还搭载了阿拉伯地区其他国家的卫星电视信号,面向整个阿拉伯地区提供卫星电视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着阿拉伯地区卫星电视的命脉。“1·25革命”爆发后,穆巴拉克政府曾一度切断半岛电视台的卫星信号,致使半岛电视台只能在其网站上发布报道。目前尼罗河卫星搭载了600家电视台的卫星信号,其中75%是免费接收的。

2001年,埃及出现了第一家私营的电视台Dream TV,该电视台主要受到年轻人的欢迎。2003年,埃及出现了第一家私营广播,性质为音乐广播。从总体上来说,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在缓慢、渐进地向更为自由的新闻环境发展,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自由观念逐步加强,他们能够公开发表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观点,其中不乏对政策和官员的有力批评。

不过,在穆巴拉克统治后期,穆巴拉克的支持率大不如前,他在经济等方面的政策以及一些腐败、滥用职权的行为饱受批评,穆巴拉克不再能以绝对多数票当选,感受到新闻自由给政权带来的威胁,穆巴拉克开始加强对反对声音的压制。2007年9月的一周之内,先后有4家报纸的编辑被以“侮辱总统”罪判处监禁、3名反对派报纸的员工因撰写有关司法部成员的文章被判2年徒刑、经常批评政府的《宪法报》编辑Ibrahim Eissa被控“危害国家稳定”。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新闻自由指数,“1·25”革命发生前的2010年,埃及的新闻自由度在178个国家中排名第127位,处于非常不自由的状态。

二、“1·25革命”中的埃及新闻业

2011年1月25日,埃及爆发了上百万人参与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穆巴拉克下台。2月11日,埃及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发表电视声明,宣布总统穆巴拉克决定辞职。2012年6月2日,穆巴拉克审判结束,84岁高龄的穆巴拉克被判终身监禁。

在“1·25革命”前,以《金字塔报》为代

表的所谓的“国家媒体”依然在埃及新闻业中占据统治地位,反对党报刊相对保守,并未真正发挥出“反对”的作用,反倒是一批私营的独立报纸对政府的批评更加大胆。广播电视业在埃及广播电视联盟的监管下也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媒体成为埃及一种重要的补充性新闻源,提供和国家媒体不一样的报道和声音。在埃及具有影响力的外国媒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媒体,如半岛电视台等,这些媒体都使用阿拉伯语,通常在整个阿拉伯地区都有影响力,在埃及也不例外;另一种是使用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的国际主流媒体,如CNN、BBC等,它们为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埃及读者和观众提供了观察外部世界以及从外部看埃及的视角。尤其是外国媒体对突尼斯革命等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报道,对埃及革命的爆发也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

“1·25革命”爆发后,埃及的国家媒体一开始采取的是对待类似游行示威的传统处理手段:一是不报道反政府活动或伪报活动规模(少报参与人数、将大规模游行示威描述成小规模不法分子骚乱等);二是夸大报道支持政府的声音,选择性呈现社会安定的画面;三是报道国外动荡,将反政府活动和外国的阴谋联系起来。如1月26日,《金字塔报》无视首都开罗的游行示威活动,头版头条报道了黎巴嫩的抗议活动,报道埃及民众和警察交换“巧克力和鲜花”以庆祝警察日,而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当天有一名示威者和一名警察在暴力冲突中死亡。2月3日,穆巴拉克辞职前8天,《金字塔报》的头版头条是“百万民众游行支持穆巴拉克”。

在这种情况下,独立报纸、私营电视台、国际媒体成为想要了解真相的埃及民众的重要新闻源。以《今日埃及》为代表的独立报纸都在醒目位置报道了游行示威活动,并在整个过程中坚持连续报道。加之半岛电视台等国际主流媒体的大力报道、游行示威相关信息通过手机和社交网络的人际传播,越来越多的民众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局势,对《金字塔报》、国家电视台等传统占



2011年1月26日,《金字塔报》头版头条配图报道黎巴嫩的抗议活动

据统治地位的国家媒体产生了信任危机,有示威者打出横幅称国家媒体是“说谎者”。

埃及新闻工作者自由和责任意识的增强导致国家媒体内部人员立场也产生了动摇。《金字塔报》的记者联名上书管理层要求报纸脱离政府。国营尼罗河电视台的多名记者因上级禁止其报道反政府示威活动而辞职。数十名记者因报道示威活动或参与示威活动、要求新闻自由而被捕,其中不乏国家媒体的记者。随着游行示威活动的进一步发展,穆巴拉克政权出现严重危机,埃及国家媒体的报道也纷纷开始转向。2月7日,《金字塔报》总编Osama Saraya在报纸头版发表专栏文章,称赞这场“革命”是“高尚的”,要求政府进行宪法上和立法上的改革。而在2月11日,穆巴拉克辞职后,一夜之间,埃及国家媒体的态度完成了更加彻底的转变。2月13日,《金字塔报》为几十年来“偏袒腐败政府”的不平衡报道道歉,声称未来要“和人民的合法要求站在一边”,成为“国家的良心”。至此,埃及所有国家媒体完成了U型转弯,各种性质的媒体形成了支持革命、谴责穆巴拉克家族及政权的一致声音。

在“1·25革命”中,网络等新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埃及互联网的发展始于1993年,最初建立的是可接入国际互联网的大学校园局域网。埃及政府从1996年开始向私人网络运营商颁发执照。自此,埃及的互联网不断发展,截至2010年2月,埃及约有1700万网民。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的兴起为埃及的互联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事实上,“1·25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网络和手机短信组织起来的。示威者们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发布消息,提供抗议活动的时间、地

点,鼓励人们参加游行示威,并实时发布活动现场情况,配以照片和视频,为媒体提供了新闻源,同时也为媒体的报道提供更多细节性的补充。首先在首都开罗爆发的抗议活动之所以能吸引大量民众参与,并迅速在埃及各地得到呼应,与网络是分不开的。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发挥出的巨大能量又进一步促进了用户的增长,形成循环效应。2011年1月到2月的一个月间,埃及的Facebook用户就增长了100万。穆巴拉克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1月25日当天就切断了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服务,不过此举招致了更大的反弹,包括国际社会的指责。2月2日,埃及恢复了互联网服务。

三、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新闻业

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的局势并没有马上安定下来。政权被移交给了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军政府的很多非民主的做法引发了新一轮的示威,另外,虽然穆巴拉克下台,但穆巴拉克政府的大量官员都依旧任职,也引发了不满。埃及复杂的政治、宗教、文化势力各派相争,使得局势进一步混乱。在随后的一年中,埃及经历了人民议会的重新选举、穆巴拉克审判以及总统大选,直到2012年6月,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新总统穆尔西上台,埃及的局势才算比较稳定。

统治了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政权一朝倒台,旧的制度和秩序解体,新的秩序亟待建立,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媒体显得异常活跃。在穆巴拉克下台后短短一段时间内,埃及新创办了25家卫星电视频道,其中部分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如1月25日电视台(25 January Channel)、解放电视台(Tahrir Channel)等。

另外,媒体的活跃也体现在敢于针砭时弊、对埃及未来的走向大胆提出意见方面。但是,媒体的活跃和敢言并不代表埃及的新闻环境有所改善。相反,在混乱时期对于新闻自由的镇压和新闻工作者的迫害问题格外突出。尤其在军方掌权的过渡时期,对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批评是不被允许的,这和穆巴拉克当政时期不允许媒体批评穆巴拉克及其家族的政策如出一辙。军方还以“未更新执照”为由查封了多家电视台,

有的甚至是在直播中被切断电视台信号。过渡时期军政府的这些举措甚至比穆巴拉克时期的新闻政策更为严厉,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新闻管控,但是这种非正式管控的效力丝毫不亚于明文规定的审查制度。一些国家媒体从穆巴拉克政权的喉舌开始变成军政府的喉舌,私营媒体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我审查。在3月9日数名示威者因抗议军政府的政策而被捕的事件上,埃及媒体就表现出了集体的失语,少量的相关报道都是基于军政府给出的公告。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新闻自由指数,2011-2012年,埃及的新闻自由度在179个国家中排名第166位,仅从这一数据上看,革命后的埃及新闻自由度是不如革命前的。

媒体的活跃同时也伴随着混乱。在革命的狂热中,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埃及本土的新闻工作者)很难保持冷静,很多报道都是带有明显偏向的,对报道本身的热情取代了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持,很多报道的新闻源都未经过确认,这直接导致了谣言在媒体上的泛滥。面对这种情况,临时政府恢复了在革命中被废除的信息部。当然,也有意见认为军政府恢复信息部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新闻的管控。

过渡时期对于埃及新闻业来说,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一方面,革命的初步胜利让埃及看到了更加民主的曙光,也让新闻业看到了更加自由的曙光。在新的秩序确立之前,对于新闻业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另一方面,革命并没有给埃及带来期望中的新闻自由,新闻环境甚至不如穆巴拉克时代,媒体格局也比较混乱。

穆尔西上台后,虽然新闻业格局伴随着政权的稳定日趋稳定,但新闻环境比起革命前并没有得到长足的改善。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在当选总统后辞去了在穆斯林兄弟会的职务,表示要代表所有埃及人民,不过他任命了穆斯林兄弟会的Salah Abdel Maqsood担任信息部长。8月,两名新闻工作者因“冒犯”总统和穆斯林兄弟会而受到起诉。

穆尔西上台后另一项较为引人注目的新闻政策是解除禁止电视台女主播戴穆斯林头巾出镜的禁令。此前50多年,埃及的电视台女主播都是不被允许戴头巾出镜的。穆尔西政府的新闻

官员表示,“这体现新闻领域的公正、公平原则”,“埃及官方电视台将出现一批戴面纱的女主播”。不过埃及记者联盟指责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的一系列做法是在试图将国家电视台变成自己的喉舌。也有评论认为,这种穆斯林传统的回归实质上被穆尔西用作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表明穆尔西正在试图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2012年9月,埃及国家电视台上出现首位带头巾出镜的女主播。

穆尔西究竟会推行怎样的新闻政策、未来的埃及新闻环境会向怎样的方向发展、埃及的新闻业能否借由此次革命变得更加自由和成熟,还有待观察。不过,有三个问题是初现端倪、值得警惕和思考的:

1.埃及的国家媒体在革命中完成了态度倾向上的U型转弯,这很难说完全不是穆巴拉克政权行将就木之时媒体的权宜之举。在后穆巴拉克时代,这些国家媒体高层经过了重新洗牌,但新上任的大多还是“旧人”,那些在重新洗牌中离开的人很多成了“顾问”。如果国家媒体不摆脱依附政府的旧习,真正以成为“国家的良心”为己任,那么革命很可能只是让它们从一个政府的喉舌变为另一个政府的喉舌。还有在革命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反对派报纸和独立报纸、私营电视台,当它们由“反对派”变成主流,能否继续批判的眼光,不偏不倚,也值得观察。

2.自由的新闻环境并非一个健全的新闻业的全部要素,过分强调自由往往容易造成客观、中立、平衡的新闻专业主义态度的缺失。过渡时期埃及新闻业的混乱状态,部分也是受到革命中自由思潮的影响。要形成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新闻工作者自由意识和责任意识的觉醒很关键。在革命中和革命后,从敢于斗争的

埃及新闻工作者身上,可以看出自由意识不断增强,但责任意识还有待加强。新闻工作者的成熟也将是决定未来埃及新闻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3.网络(尤其是社交网络)在埃及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革命后的埃及也继续蓬勃发展。但是,社交网络之所以能在革命中大放异彩也是有其特殊原因的:社交网络的特性能够较好地满足革命中信息传通的特殊需求,这是传统媒体无法取代的,在号召力上甚至也超越传统媒体,由于互动性更强效果也更加立竿见影。换句话说,社交媒体比传统媒体更能满足革命这种特殊社会状态下的需求。但是,在革命后,社会秩序重建的过程中,社交网络能否延续影响力、成为社会常态下埃及民主议程的有效公共场域,还值得商榷。

参考文献

- [1][2]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二)[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378-379.
- [3]陶涵主编.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M].天津出版社,北京,1989:248.
- [4]参见尼罗河卫星网站<http://www.nilesat.com.eg/Services/BroadcastingServices.aspx>.
- [5] J. Black: Egypt's Press: More free, still fettered, Arab Media & Society, 2008.
- [6][14]参见Wikipedia Press Freedom Index条目http://en.wikipedia.org/wiki/Press_Freedom_Index.
- [7][9][11]M. Peterson: Egypt's Media Ecology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2011.
- [8]Washington Post, Egypt's state-run media starting to shift from pro-Mubarak coverage, February 9, 2011.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1/02/09/AR2011020906234.html>.
- [10]B. Rotheray: Good news from a far country?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broadcast news supply in Africa and South Asia, The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 [12][13]N. Abdel-Sattar: The post-mubarak egyptian television, 2011.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2103222>.
- [15]中华网国际新闻 埃及两记者将被控诽谤总统及58次冒犯穆兄会 2012-8-14. <http://news.china.com/international/1000/20120814/17372276.html>.
- [16]人民网穆尔西大刀阔斧改革国家电视台 女主播首次戴面纱出镜[OL]2012-9-5. <http://pic.people.com.cn/n/2012/0905/c1016-18923875.html?prolongation=1>.